

# “惡”亦有力量

## ——解析《索菲婭的禍端》中的三重身份認同

閔雪飛

---

**【提要】** 巴西女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短篇代表作《索菲婭的禍端》描述了一位九歲女童在成長關鍵時段的特殊心理經驗。主人公借助於存在認知、性別意識與創作本能這三個層面的身份認同發展，最終獲得了自我成長。本文將以故事主角對於“惡”的覺知為焦點，力圖通過詳細的文本分析，結合精神分析理論與性別理論，來探討存在認知、性別意識與創作本能這三種內在動力在故事裡的具體呈現與關聯，並通過分析它們與“惡”之間的生成關係，來揭示“惡”如何從根本上啟動了主體身份構建的進程。

**【關鍵詞】** 惡 女性成長 身份認同 李斯佩克朵

**【中圖分類號】** I2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4 - 0171 - 08

---

女性如何獲得主體身份？這是巴西女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 1920 — 1977）<sup>①</sup>以全部作品不斷提出的問題。在其短篇代表作《索菲婭的禍端》中，通過小女孩索菲婭的成長往事，作家再一次聚焦女性的主體性建構問題。故事以第一人稱敘述，情節核心為小女孩索菲婭對男老師發生的特殊情感。儘管老師頹唐且醜陋，但幼小的索菲婭却被他吸引，產生了一種以破壞課堂秩序與不認真學習來表達的奇異之愛。索菲婭以為老師討厭她，然而突然有一天，兩人之間的關係改變了。老師給學生們講了一個勤勞致富的故事，讓學生們寫成作文，索菲婭卻改變了這個故事的道德主旨，寫成了一個“不勞而獲”的故事，沒有想到却因為豐富的想像力而獲得了老師的贊賞。突發之事帶來“頓悟”（epifania），年幼的索菲婭因此真實感受到了存在之價值及成長的快樂與痛苦。而且，也讓她認清了自己的使命與志願：成為一名作家。

這篇小說可以被視為“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或者“女性成長小說”（Female Bildungsroman）的變體。囿於短篇小說的有限篇幅，克拉麗絲無法以線性時間循序漸進地推進主人公從童年到青年的完整成長過程，因此，她選取了一個具有神秘主義的突發事件，用以凝縮一個小女孩成長過程中凸顯的種種心理矛盾。索菲婭的成長多面而立體，外界的壓力固然是動因之一，但首先是她對於自身存在的體認與接受。對於小女孩索菲婭這個獨特的個體，“成長”、“自

我認同”、“身份尋找”三個同質詞與“存在”之間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惡”這個概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爲了深入理解“身份認同”與“惡”之間的關係，必須首先對克拉麗絲作品中的“善惡”與“存在”概念進行界定。“善”與“惡”之間的辯證關係構成了恒久的文學主題，現代主義文學之前，創作者一般側重於從倫理角度思考“善惡”，隨著文學與藝術的發展，“惡”也經歷了價值轉換。1800年前後，“惡”逐漸發展爲一種“獨立的美學”，成爲了現代主義文學及之後的文學流派探討的重要內容，在這些討論之中，“惡”不再具有道德指涉，而是一個審美經驗的對象。<sup>②</sup>在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作品中，關於“善惡”的討論同樣是超越道德論層面的。克拉麗絲筆下的“善”與“惡”可以在存在論範疇內展開闡釋，是一種揭示存在與真實的工具。爲了獲得“真實”，她必須消滅一切二元對立，“善”與“惡”可以相互轉化。另外，儘管克拉麗絲沒有直接承認，但她的“存在”觀念應該受到薩特的影響。對於克拉麗絲，“存在”是一種本質，天生便具有。人必須通過自由方能具有主體意識，而“惡”的意識對於促成自由起著重要的作用。《索菲婭的禍端》是消滅善惡二元觀念與自由促成意識的典型代表，作家將焦點置於“惡”的僭越性上，“僭越”能力促使主人公分別從“存在意識”、“性別意識”與“創造本能”這三個層面突破限制，形成真正的主體意識，最終確認了自己作爲人、女性與作家的多重身份。

### 一、人之識

“戲仿”是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實現作家主體性的重要途徑，很多作品均涉及“戲仿”。《索菲婭的禍端》也是一部戲仿之作。十九世紀，法國女作家塞古爾伯爵夫人創作了《索菲婭的禍端》（*Les Malheurs de Sophie*）。<sup>③</sup>這部同名小說以“惡”爲主題，主人公是一個淘氣的四歲小女孩索菲，她頻繁惹是生非，但終於在祖母和母親教導下，學會了“向善”，並成爲了小女孩中的楷模。克拉麗絲筆下的“索菲婭”與其模仿的塞古爾伯爵夫人的“索菲”之間存在很多相同之處，倆人名字相同，都具有“智慧”含意；倆人都調皮搗蛋，擁有一個無法無天的童年，與純真無邪的孩子形象有著相當大的差別；但兩個孩子在行“惡”的時候，往往本著一個善良的動機。然而，就“惡”之本質而言，她們之間是絕然不同的。塞古爾伯爵夫人筆下的“惡”是道德論範疇的。四歲索菲的“作惡”是因爲年少，而她自己對此完全“無知”，需要成人道德觀的介入，她才能瞭解“惡”的後果與危害。通過索菲，塞古爾伯爵夫人成功地建立了一種模範孩童的成長模式：因爲無知而做錯事、承受懲罰、感到後悔，再次因爲無知而做錯事、承受懲罰、感到後悔。索菲的成長在這一系列循環之中發生，直至她在不斷的教化中獲得了理性，最終打破了這個循環。這類“幸福大結局”的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兒童文學的目的在於道德教化，需要將既定價值觀與樂觀精神傳遞給讀者。而克拉麗絲筆下的故事却顛覆了孩童成長模式，並不承擔教化的任務，提出“惡”的目的不在於糾正主人公的“惡行”，也不想普世的理性與道德譜系中爲主人公尋找到位置，而是將“惡”的僭越性作爲主人公認識自己與存在的原動力來處理。

一如前述，“索菲婭”這個名字本身承載著意義，其希臘詞源意味著“智慧”，並直接指向德爾菲神廟中的著名神諭：“認識你自己”。對於克拉麗絲筆下的索菲婭，成長即是“認識自我”、“尋找身份”，也是構建自身主體性的過程。主體性的構建在對“惡”的三個認識階段裡展開：意識“惡”、拒絕“惡”、接受“惡”。克拉麗絲筆下的這種超越道德的“惡”其實質是“欲望”的特殊表現方式。從黑格爾開始、經由尼采與弗洛伊德，直到拉康，均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

“欲望”對於個人主體性建構的動力作用。黑格爾認為，沒有欲望與匱乏，就談不上自我意識。<sup>④</sup> 索菲婭是一個小女孩，處於從幼兒到少女的關鍵時期，有強烈的成長欲望。這種無意識的欲望主要通過“作惡”的方式獲得具體化呈現。值得注意的是，“欲望”的覺醒固然不能脫離性別意識的覺醒，但首先是針對她作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去道德化、去性別化的，具有本質特點。只有索菲婭感受到“惡”，才可能意識到存在的真實，只有索菲婭真正接受“惡”，接受這個異化的“自我”，才可能真正成長為人。

兒童索菲婭首先要面對的是“沒有盡頭”的童年。“童年”是克拉麗絲在各個時期作品中不斷書寫的主題，其所指並非是某種特定年齡階段，而是一種看待存在的方式。《索菲婭的禍端》中說明了“無知”是童年最重要的特徵，兒童並不具有“認識自我”的能力，而是用“無知”這種方式來看待存在。“無知”與索菲婭母親“純潔”直接對應著“無知”，“邪惡”直接連接著“有識”，這樣，就在“善惡”與“認識”之間形成了關係建構。在另一部短篇小說《筆端的男孩》中，克拉麗絲曾通過下面這一段幽深隱微的文字表述了對“善惡”與“認識”之間辯證關係的看法：“如何才能永遠不瞭解這個男孩？為了瞭解他，我得等他腐壞，只有那時，他才在我的掌握中。他在那裡，無限的某處。沒有人會瞭解今天的他。連他自己也不行。”<sup>⑤</sup> 這個尚處於幼兒時期的男孩是“純潔”的，以“無知”這種方式存在，因此，其他人無法瞭解他，連他自己也不可以自識。只有通過“腐壞”，亦即破壞了“純潔”，進入並感受到“惡”，才可能打破這種“無知”。這是由“惡”的僭越性而決定的，惡具有破壞力與毀滅力，從而有能力打破成規與習俗的面具，揭示隱藏在下面的真實。因此，唯有“惡”而不是“善”能夠形成認識：對自我的認識與對他人的認識。以此，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將體認到“惡”等同於從“無知”上升到“有識”的過程，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

克拉麗絲生前最後一部作品《星辰時刻》中的主人公瑪卡貝婭是一個極端的形象，因為她完全無知，比嬰兒更無辜與純真。在瑪卡貝婭“身份找尋”的過程中，可以更清楚的瞭解克拉麗絲在寫作中不斷闡述的“惡”對於“自我認識”的動力作用。瑪卡貝婭無知得幾近痴傻，根本無法進行“自我叩問”，因此她“不識自我，而是隨波逐流地生活。如果她愚蠢地自問‘我是誰？’，會被結結實實地攆在地上。因為這一聲‘我是誰’會造成需要”。<sup>⑥</sup> “需要”意味著意識到匱乏與欲望，瑪卡貝婭見過占卜師，對生活稍微起了一些貪婪之心，經由這種欲望化的“腐壞”，她才開始質疑自己的身份，組織起“自我叩問”，真正具有了存在意識。

小女孩索菲婭的這個特殊的成長階段中，充滿了種種“惡”與“無知”的相互指涉，九歲的索菲婭感受到匱乏與欲望，她不滿於“無知”，希望越過“純潔”的幼兒階段，向青春期走去。索菲婭意識到“我有一種智慧，壞人——那些於驚駭之中啃咬指甲的壞人——生來便具有這種智慧”，<sup>⑦</sup> 智慧指向了“認識”，壞人指向了“惡”，這樣，在這部短篇小說中，“認識”與“惡”的對應關係便基本構成，而且，對於索菲婭，這種“惡”具有本質性，只是需要她去察覺並深化認識，或者如她在作文中所寫，需要去“發現”，這樣，她的成長便在對“惡”的不同認知階段中逐步展開。

小說之初，索菲婭對於自身本質之“惡”已經具有了懵懂認識，家中的女傭這樣形容索菲婭“這姑娘可不是一朵香花”，這種對孩童索菲婭之“惡”的判斷，大體等同於法國索菲式的“淘氣”，並不涉及本質之“惡”的描述，而是一種要求“善”的世俗道德觀的折射，不是索菲婭“惡”之意識發生的原因，但他人的判斷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索菲婭對於自身之惡的體認。正是基於對

自身之“惡”的體認，索菲婭才逐漸感覺到了真實存在，最重要的證明便是她的自我認識全部由負面語彙構成，包括“酸澀的秋海棠”、“愛的黑暗之夢”、“傷心的我成了他的魔鬼與折辱”、“我是地獄的象徵”、“我感覺我的角色惡毒且危險”、“那個時代的所有大人與所有小孩之中最不堪重用的那個人”等等。<sup>⑨</sup>當她體認到“惡”，便是認同了“惡”所具有的僭越性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推動她揭示屬於自己的真實，而不是由他人認定的真實。但真實所帶來的並非全是安全感，也可能會帶來危險。這也是“惡”所具有的破壞與毀滅能力的體現。

前青春期的索菲婭體認到的“惡”與其成長欲望緊密糾纏，當索菲婭感受到身處“所有大人”與“所有小孩”之間時，她便成爲了一個獨立於空白地帶亟需找到社會身份的人。她充滿了身份混亂，以至於感到“下不了決心成爲哪一個我；我無法成爲全部的我”。<sup>⑩</sup>通過對“惡”及“惡”所帶來的真實的體察，她意識到了成長的冒險性，發現“被牢牢粘在了一種我全然無知的危險的本質之上”。<sup>⑪</sup>對於前方的路途，她一無所知，但又必須認識。索菲婭的命途只有一條：勇敢向前，縱身躍進那種未知的危險之中，真正成爲大人。然而，“從前，無知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嚮導，如今它却第一次不再保護我”，由於脫離“無知”的危險性，繼續當個小孩子的誘惑始終伴隨著她，因爲這意味著穩定與安全感，這樣，隨著小說情節的推動，在索菲婭的成長過程中，不乏索菲婭希望擺脫大人，“在那些孩子我的同齡人中尋找庇護”的特殊狀態描寫。<sup>⑫</sup>因此，索菲婭成爲了矛盾的綜合體，她既渴望長大，希望脫離無知的狀態，又害怕認識自己與真實帶來的風險與未知的後果。這種認知矛盾造成了她針對作爲成長與認知的原動力“惡”的矛盾態度：既體認到了惡、並被惡吸引，又拒絕惡、討厭惡。就小說情節而言，對“惡”的這種雙重態度主要投射於她對老師——她的對立面與另一個自我——的情感上。

## 二、性別認同

索菲婭的成長中包含了對於女性身份確認的欲望，主要體現在九歲的索菲婭對目前這種髒孩子身份的不滿與對未來“大姑娘”形象的期望：乾乾淨淨，優雅得體，有一頭順滑的直髮。在對教師這個異性“他者”的想像中，索菲婭得以確定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克拉麗絲的著作中，教師形象頻繁出現。處女作《瀕臨狂野的心》中，主人公約安娜擁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學教師，也通過寫作文這種方式啓迪學生。在《一場學習或歡愉之書》中，主人公洛麗本身就是一位教師，通過“自我教育”，完成了“自我認同”。這些教師儘管形象各異，但都符合“成長小說”傳統：亟待成長的主人公必須擁有一位有社會經驗的成熟的“導師”，指導他獲得社會身份並融入社會。在《索菲婭的禍端》中，教師再一次登場。然而，這位無名的中年男子却是以“反題”的面目出現，是一位失敗的“導師”。

一如索菲婭，老師的身份認同充滿了混亂。索菲婭渴望成長、成爲大人，因爲大人是優雅的象徵。但是，老師並不具有小女孩索菲婭所希冀的大人的莊重與整潔，而是一位有著“傾頹的雙肩”的邇邇中年人，在本應該以“美”爲道德原則的老師身上，凝聚了醜陋與不和諧。在教師本該具有的耐心中，充滿了無視與不耐心。大人本該是智識的榜樣，可是他却輕易地被小孩欺騙。老師本該對學生負起引導責任，但他却無力控制班級。總而言之，這位“反導師”是“惡”的。然而，索菲婭却“被他吸引了”，而且文章中強調是“被他的沉默以及教我們時強自克制的不耐煩所吸引”，換言之，她不是被“美好”而是被“邪惡”所吸引。<sup>⑬</sup>另一方面，老師身爲大人，却如孩童一般無力，索菲婭身爲孩童，却渴望成爲大人並致力模仿大人，老師本該成爲“導師”，

但在小說中儼然“被教導者”。拉康認為，主體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關係，一種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索菲婭和老師的身份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交換，構成鏡像關係。索菲婭的主體生成建立在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基礎之上。索菲婭對於老師的矛盾情感，是她自身欲望的投射。被老師之“惡”吸引，其實是意欲觸探自身之“惡”，認識老師之“惡”的過程，可以被視為認識自身的過程。

面對老師之“惡”亦即自身之“惡”，面對自身的“欲望”，索菲婭被深深吸引，然而，她又要去“拯救”，把老師和自己從“惡”中解救出來，這同樣清楚地表明瞭她對“惡”的拒斥態度。然而，索菲婭拯救的方式非常特別，不是通過教化，而是“要通過誘惑把他拯救”。“拯救(salvação)”與“誘惑(sedução)”本身是宗教詞匯，“拯救”意味著“善”，誘惑象徵著“惡”，具有不相容性。然而，當“拯救”與“誘惑”通過索菲婭的行為實現相伴相生之時，這兩個詞匯在意義上也開始了彼此污染。索菲婭的拯救具有了特殊性，不再是普通的“以善救惡”，而是“以惡救惡”，這樣，在目的與手段之間形成了斷裂：為了實現一個“善”的目標，必須以“惡”作為方式。索菲婭的自我認同過程也成為了不斷延續的變形記，她的身份再一次具有了二重性：既是誘惑者，又是拯救者。

當誘惑者與拯救者連接在一起，索菲婭的身份認同能夠前進到什麼程度？一方面，索菲婭的拯救之愛具有愛欲性，呼應著其性別意識的萌生，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索菲婭對“誘惑者”身份的承認上。這種身份認同不僅意味著索菲婭加強了對於自身之“惡”的體認，而且象徵著索菲婭對於其女性身份的確認。經由誘惑，索菲婭的自我認同在“邪惡超我與色情自我”之間的辯證關係中形成，而且，“愛若斯(Eros)與剎那托斯(Thanatos)之間的結合推動著情節向前發展”。<sup>18</sup>對於原罪的討論是西方女性主義諸多學派涉及到的命題，以夏娃為代表的誘惑者之“惡”具有明顯的性別指向，這種“惡”是西方傳統強加給女性的“身份特徵”。當索菲婭從小女孩向少女轉變，由於性別意識的增強，必然產生“惡”與“原罪”的意識。索菲婭對“誘惑者”身份的承認直接指向青春期對於女性性別身份的懵懂體認。由於共同的“力比多”指涉，在克拉麗絲的寫作中，“惡”、“罪”、“歡愉”、“快樂”等詞匯具有同質性，“誘惑”之“惡”不能離開“性”而實現，欲望之滿足會導致歡愉及負疚，因此，索菲婭的自我認同朝向一個全新的方向開放，將自己認同為“婊子”以及“快樂而邪惡的修女”，並擁有了“方室之內修女的熾熱”，形成了具有明顯性別與愛欲特徵的新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索菲婭的拯救之愛又是非愛欲的，然而通過戲仿與顛覆，這種非愛欲性深化了索菲婭的“惡”之體認，也加強了她的性別意識。

首先，當索菲婭發現“我成了婊子，而他成了聖徒”時，<sup>19</sup>如果說“婊子”的目的在於誘惑，而“聖徒”的目的在於“拯救”，鑒於索菲婭與老師的鏡像關係，索菲婭身份的二重性有了更清楚的界定：既是一個目的為拯救的“婊子”，又是一個主動實施誘惑的“聖徒”。聖徒身份與“拯救”自身的純潔性要求她禁絕欲望、禁絕誘惑、禁絕各種惡，換言之，拯救者亦即“犧牲者”。索菲婭用自身的撒旦行為為“拯救是一種犧牲”做了真誠的註解。索菲婭的拯救行為通過“高聲喧嘩，與同學打鬧，講笑話不讓繼續上課”展開，收穫的只有老師的無視。她的行為一如耶穌，拯救並不為被拯救者所理解。在“殉道者的光榮”中，撒旦模仿了基督，小說也再一次成為了戲仿——對聖經文本的戲仿。小女孩自認為邪惡，亟需通過一個對他者的拯救行為，以期達到大人的善。她的拯救行為獲得的不是理解，而是憎恨，即便冒著“殉教”的危險，却如基督一般，始

終堅持著信仰。這種戲仿又是顛覆性的，在基督教的文化裡，唯有耶穌才能去拯救，邪惡的人並沒有權利與能力去拯救他人，但在這裡，邪惡的人可以去拯救別人，因為具有從庸常中突圍的力量的是撒旦的“惡”而不是耶穌的“善”。

其次，索菲婭所化身的撒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撒旦，而是一個具有強烈性別意識的女性撒旦。索菲婭表面上通過“並非是以女人、有朝一日會變成女人的方式，而是作為一個孩子，試圖拙笨地保護一個成人”的表述規避其拯救手段對性別意識的承認，<sup>⑩</sup>但這種表述本身便已經強化了其最終方向是“有朝一日會變成一個女人”。而且，索菲婭認同自己為“領報的童貞女”，童貞女瑪利亞的受孕是“無原罪”的，剝離了所有關於性的指涉，這一切都仿佛與之前的性別認同構成了矛盾，然而，撒旦原本正是純潔的天使，因為惡念的萌生與誘惑行為的施加，被逐出了天國，正是這種純潔與邪惡的相混使得索菲婭成為了天堂之中的女性撒旦。索菲婭用她的惡行模仿了撒旦向下的墮落。在對聖經文本的顛覆性戲仿之中，在性別角色的交換之中，在對性故意為之的規避之中，索菲婭的性別意識獲得了加強，最終確定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 三、創造之體認

索菲婭身份找尋最為關鍵的層面是對作家身份的承認。在小說的開頭，克拉麗絲已經通過兩種方式向讀者暗示了主人公的這一重身份。首先，通過敘事。這篇小說具有“元敘事”特點，包含了三層敘事：1. 老師所講述的故事。2. 索菲婭對於老師所講述的故事的再敘事。3. 敘事者以第一人稱對於索菲婭與老師之間故事的講述。講述整個故事之前，敘述者使用了大量筆墨陳述寫作的困難，這一切都暗示了寫作者的身份。其次，通過時間。這篇小說共有三個時間：1. 索菲婭九歲之時：故事發生的時間。2. 索菲婭十三歲之時：知道老師死亡的時間。3. 索菲婭以第一人稱寫出這篇小說之時。通過寫作的完成，經由惡激發的命名與自我命名，兒童索菲婭真正形成了自由，並終於在成長中確認了這重身份。

索菲婭的自我就像老師故事中的寶貝一樣，被掩埋在了肮髒的院子之中。必須透過“肮髒”的表相、去除“惡”的面具，才可能發現真正的寶貴自我。在小說中，打破“惡”的面具的行為最終通過“頓悟”（Epifania）實現。“頓悟”本為宗教術語，意指是初生的耶穌在東方三王面前的突然顯現。詹姆斯·喬伊斯將其移用到文學領域，成為了意識流作家常用的文學技巧。克拉麗絲習慣在寫作中頻繁使用“頓悟”，通過一件卑微、渺小、無足輕重之事的發生，臨事者有了猶如基督顯現一般的精神開悟。“頓悟”某種程度上深化了其作品中的神秘主義成分，這一點在《索菲婭的禍端》中獲得了充分的體現。隨著情節的發展，之前一直在回避的師生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事件發生在教室。這是一處特殊的空間，四面牆圍成了一個封閉的空間，但又並不具有完全封閉性。穿過這個教室，就會到達操場，操場其實是個公園，完全的自然之境，仿佛無邊無際。教室的這種特性使其成為了童年的隱喻，需要走過這段封閉的時期，才可以到達想像中的廣闊無邊的豐富成年。小女孩索菲婭希望快速寫完作文，她想逃離的不僅僅是這個教室，而且是無望而且無知的童年時期。面對堅硬而封閉的牆，在目光與目光相對並發生“他者”凝視之時，她無可退縮，只能勇敢向前。

寫作文的一幕，讓“惡”的僭越能力達到了頂點。老師講述的故事是對勤勞美德的褒獎，符合常規與傳統的道德觀，然而索菲婭却完全扭曲了道德觀，這固然是因為她的自身之“惡”，因為她不喜歡勤奮刻苦，“全然相信著一向順遂的游手好閑”，<sup>⑪</sup>但更重要原因在於，老師要她

用“自己的話”去寫。因為這個要求的提出與滿足，這篇文章將寫作的賦形以隱喻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首先，可以從教師的職業上理解“惡”、“詞語”與“寫作”之間的關係。克拉麗絲的密友與傳記書寫者奧爾加·德·薩在談到她作品中頻繁出現的教師形象時，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在為其作品中的所有教師角色創造命運之時，對於這另外一種與語詞有關的職業，她表現出了撒旦般的善心。她同情這個職業，因為教書的活動，因為同樣是詞匯的匠人。但她最終却總是犧牲了教師，或讓他們沉默。”<sup>⑩</sup>《索菲婭的禍端》中的這位無名教師，儘管沉默，儘管失敗得不像教師，却終於承擔起了“傳遞詞匯”這個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他確實無愧於語詞的導師。

其次，經由“用自己的話”去寫的指示，索菲婭在去自由地去書寫“惡”時，感受到自由意志，她的意識主體地位完全建立。通過書寫，她體認到了另外一重身份：作家——被書寫誘惑並被書寫拯救的人。在這重潛文本中，書寫同時行使了誘惑者與拯救者功能，因為“惡”的僭越與創造力量，這個書寫的隱喻不僅扭曲了既定的價值觀，而且又一次構成了“創世紀”，將作家與文本的誕生用語詞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通過對這個故事的改寫，索菲婭完成了身為作家的自我命名。

然而，僅以“寫作”這個行為的發生並不足以使索菲婭對作家的身份本身具有完全的意識。索菲婭的“頓悟”發生，依賴一件看似無足輕重的小事：老師呼喚了她的名字。“這時，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sup>⑪</sup>直到此時，讀者才發現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其實一直處於匿名狀態，她一直以“我”指稱，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名字是“索菲婭”。通過題目戲仿法國兒童小說《索菲婭的禍端》與第一人稱敘事，克拉麗絲成功地讓讀者誤以為主人公的名字是“索菲婭”，將主人公的真名封存在地下，然而，這突然而知的呼喚却打破了“匿名”之面具，命名就此形成，不但讓主人公有了名字，而且讓讀者意識到之前對主人公身份的誤解，“索菲婭”被隱藏的真實身份以這種方式被“發現”了出來。命名本身具有象徵意味，意寓著創造，作為小說中的形象，因為命名，主人公真正具有了生命與自我意識。

索菲婭對於作家身份的意識同時依賴於對創造之“惡”的完全接受。老師對她說：“你的作文很好看。”<sup>⑫</sup>索菲婭因這句話而進入了恐懼和惶惑之中，這是一種猛醒，因為她對於“小說”或“虛構”的“邪惡與誘惑之能力”有了頓悟。對於索菲婭，文本，或者文學生產，所產生的後果完全出乎她的意外。索菲婭改寫故事的初衷有兩個：一為迅速交差，二為激怒老師，這兩個理由都是惡的，而且，從倫理的角度而言，索菲婭改寫的故事鼓勵不勞而獲，也是惡的。但是這些惡之因却結出了善之果，索菲婭與老師的身份又一次發生了互轉，老師成為了誘惑者與拯救者，索菲婭成為了被誘惑者與被拯救者。“頓悟”之後的索菲婭又恢復了平靜，但這種平靜與頓悟之前並不相同，因為通過書寫提供的誘惑，索菲婭意識到自己的“利爪”或自身之惡所帶來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她成為了“造物之王”。以此，索菲婭完成了自我救贖，對於寫作的本質與其後果具有了自覺的意識，並憑此認識到了自己的最後一個身份：作家。最後，當這篇小說落下最後一個句號之時，索菲婭在文中暗示的最後一個時間點終於完成了老師與自己之間發生的故事的敘述，她的成長在這一刻全部完成。如果說在拉康視野中，自我是分裂的，而且無法為現代人的理性所掌握。那麼，通過主人公索菲婭那一瞬間的成長中所蘊藏的豐富的身份認同，尤其通過最後呈現的創造之能量，克拉麗絲憑藉著“惡”那蓬勃而又神秘的力量最終為分裂的自我尋覓到了一個彌合的契機。

①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出生於烏克蘭，不久與父母移民巴西。由於當時巴西移民資料管理的混亂及作家的刻意隱瞞，在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生前，人們無從知道她的確切出生年份，存在著1925、1926與1927三個版本。在她逝世之後，經過傳記學者潛心鉤沉，作家的出生年份最終被確定為1920年。對於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巴西學界一般用名字“克拉麗絲”而不是姓氏“李斯佩克朵”指稱，本文將遵循巴西學界的傳統，以下如非必要，僅使用克拉麗絲。

②彼得·安德雷·阿爾特：《惡的美學歷程——一種浪漫主義解讀》，寧瑛、王德峰、鍾長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③中文譯名為《淘氣的小蘇菲》，見塞居尔伯爵夫人：《法國優秀兒童作品選（上）》，李蘊珠、鞠惠芬譯，

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5年。

④趙一凡：《從胡塞爾到德里達——西方文論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316頁。

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隱秘的幸福》，閔雪飛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136、99、98~100、102、107、107~108、98、98、98、102、107、104頁。

⑥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星辰時刻》，閔雪飛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9頁。

⑬ Yudith Rosenbaum, *Metamorfoses do Mal: Uma Leitura de Clarice Lispector*, São Paul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06, p.57.

⑰ Olga de Sá, *A Escritura de Clarice Lispector*, Petrópolis: Editora Vozes, 1979, p.159.

#### 參考文獻：

[1]Earl E. Fitz, *Sexuality and being in the poststructuralist universe of Clarice Lispector: the différance of desir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2]Earl E. Fitz, *Clarice Lispector*,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5.

[3]Clarice Lispector, *Felicidade clandestin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Rocco, 1998.

[4]Marta Peixoto, *Passionate fictions: gender, narrative, and violence in Clarice Lispec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5]Cristina Ferreira Pinto, *O Bildungsroman Feminino*:

*Quatro Exemplos Brasileiros*, São Paulo: Editora Perspectiva S.A, 1990.

[6]周小儀：《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鏡像理論”》，北京：《國外文學》，1996年第3期。

作者簡介：閔雪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